

《隋书经籍志》是一部版本目录

曹 之 孙文杰

摘 要 《隋书经籍志》既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命名的史志目录,又是一部版本目录,其《总序》部分是一部写本目录,而正文部分则著录了大量的同书异本。《隋书经籍志》成为一部版本目录,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。编撰《隋书经籍志》是一个较大的工程,绝非一人所可为,其预修者有待详考。而书中所提“传拓之本”,似为“响榻”之误。参考文献 7。

关键词 隋书经籍志 版本目录 古籍

分类号 G256.22

ABSTRACT In this article, the authors verify the author of *Sui shu jing ji zhi*, confirm that it is a catalog of edi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general arrangement, text and rubbings, etc, and finally analyze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. 7 refs.

KEY WORDS *Sui shu jing ji zhi*. Catalog of editions. Ancient books.

CLASS NUMBER G256.22

《隋书经籍志》既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命名的史志目录,又是一部版本目录。对于前者,论者夥矣;对于后者,世鲜有论。本文试就后者,略陈固陋。

1 《隋书经籍志》的编撰者

《隋书》的编撰分为两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纪传部分的编撰,和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齐书》(为区别萧子显撰《南齐书》,后称《北齐书》)、《周书》一样,先后编撰两次,成于唐太宗贞观十年(636年);第二阶段是十志部分的编撰,始撰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(641年),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(656年)^[1]。《隋书经籍志》就是十志之一。关于《隋书经籍志》的编撰者,历来说法不一,或称魏徵撰,或称李延寿、敬播同撰,不一而足。据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:“隋史序论,皆徵所作。”《旧唐书经籍志·叙》引用毋甋的话说,《隋书经籍志》“所用书序,咸取魏文贞。”“文贞”是魏徵的谥号,可见《隋书经籍志》的序言似由魏徵所作。然而魏徵卒于贞观十七年(643年),十志刚刚编撰两年,距成书还有十三年。一般来说,序言的撰写时间应在全书写成以后。既然

如此,魏徵似不可能超前写出序言。据《北史·李延寿传》:“(贞观)十七年,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《隋书》十志,复准敕召延寿撰录,因此遍得披寻。”又李延寿上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表云:“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书,是贞观中敕撰,以十志未奏,本犹未出,然其书及志,始末是臣所修。”^[2]可见李延寿确实预修包括《隋书经籍志》在内的十志。据清姚振宗撰《隋书经籍志考证·叙录》:“大抵是志初修于李延寿、敬播,有网罗汇聚之功;删订于魏郑公,有披荆剪棘之实。撰人可考见者凡三人。旧本题魏徵等撰,徵实可信也。”郑国公是魏徵的封号。如上所言,魏徵已于成书十三年前死去,怎么可能进行“删订”工作,“有披荆剪棘之实”呢?至于敬播,据《旧唐书·敬播传》:“又撰《太宗实录》,从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,为二十卷,奏之,赐帛三百段。后坐事出为越州都督府长史。”这就是说,从贞观十五年(641年)到贞观二十三年(649年),敬播因预修《太宗实录》而不可能预修《隋书》十志,从贞观二十三年(649年)到显庆元年(656年),只有七年时间,敬播或因“坐事出为越州都督府长史”,似不可能参预《隋书》十志的收尾工作。总而言之,《隋书经籍志》的

编撰者只有李延寿确信无疑。但从《隋书经籍志》前后体例不一等情况分析,该志当非出自一人之手。编撰《隋书经籍志》是一个较大的工程,绝非李延寿一人所可为,魏徵、敬播等其他预修者待详考。

2 《隋书经籍志·总序》是一部写本目录的汇编

图书版本就制作方式而言,约分写本、印本两个大类。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前,社会上流布的图书都是写本。《隋书经籍志·总序》历述写本源流,是一部历代写本目录的汇编。从汉代到隋代,官方编制了大量写本目录,如刘向等《七略》、班固《汉书艺文志》、郑默《中经》、荀勖《中经新簿》、李充《晋元帝四部书目》、谢灵运《四部目录》、王俭《七志》、王亮等《四部书目》、任昉等《四部目录》、阮孝绪《七录》、隋代诸目等,备述历代书数及其兴替,不仅是一部隋代以前图书的聚散史,而且是一部校书史、抄书史和编目史。就其本质而言,校书就是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别,历代学者为比较同书异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古代抄书总是和校书、编目紧密相连。每一次校书之后,照例都要按照定本抄写一遍,然后编成目录,编目就是据写本而编。从汉代开始,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图书抄写工作。汉武帝时,已“置写书之官”;晋代《中经新簿》著录的就是“盛以缥囊,书用细素”的帛书写本;南朝宋时,收藏的也是“赤轴青纸,文字古拙”的写本。隋代更加重视写本,“每书一卷,赏绢一匹”。隋炀帝即位后,“秘阁之书,限写五十副本”。抄写图书数量之多,可想而知。《隋书经籍志》就是一部写本目录。另外,从《隋书经籍志·总序》的行文来看,也使用了旧本、异本、古本、正本、副本等版本学术语,例如《总序》云:“周武平齐,先封书府,所加旧本,才至五千。”这里所谓“旧本”,就是指时间已久的早期抄本。《总序》云:“隋开皇三年,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,搜访异本。”这里所谓“异本”,就是指同书的不同版本。《总序》云:“及平陈已后,经籍渐备。检其所得,多太建时书,纸墨不精,书亦拙

恶。于是总集编次,存为古本。”这里所谓“古本”,就是指南朝陈的写本。《总序》又云:“(平陈已后)召天下工书之士,京兆韦霁、南阳杜颢等,于秘书内补续残缺,为正副本,藏于宫中。”这里所谓“正本”即国家正式收藏、错误较少的善本。“副本”即据正本誉录的抄本。可见隋代已有收藏正本、副本的规定。除了以上这些版本学术语之外,还有不少关于版本的记载,例如《总序》云:“(汉代)去圣既远,经籍散逸,简札错乱,传说纰缪,遂使《书》分为二,《诗》分为三,《论语》有齐、鲁之殊,《春秋》有数家之传。”也就是说,《尚书》有今文、古文两种版本,《诗经》汉代以前有鲁、齐、韩三家版本,《论语》有齐、鲁两家版本,《春秋》有左氏、公羊、谷梁、邹氏、夹氏等诸家版本。

3 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的同书异本

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的同书异本很多,主要有:(一)存本和亡本。存本即流存下来的本子,亡本即已经亡佚的本子。《隋书经籍志》用大字著录者都是存本,小字著录者多为亡本。如晋《傅玄集》十五卷是存本,五十卷(另录一卷)是亡本;晋《王坦之集》七卷是存本,五卷(另录一卷)是亡本;晋《王珣集》十一卷是存本,十卷(另录一卷)是亡本;晋《陆机集》十四卷是存本,四十七卷(另录一卷)是亡本。(二)全本和残本。全书即卷数完全的本子,残本即卷数残缺的本子。《隋书经籍志》用大字著录者大多是全本,残本著有“残缺”二字。如晋《稽喜集》一卷、晋《羊祜集》一卷、晋《张骏集》八卷、晋《孙放集》一卷、晋《戴逵集》九卷等都是残本。比较而言,全本在《隋书经籍志》中占绝大多数,残本是极少数。(三)正本和别本。正本之义已如上言,别本即正本之外的同书异本。如晋《刘琨集》九卷是正本,《刘琨别集》十二卷是别本;南朝宋刘义恭撰《江夏王义恭集》十一卷是正本,《江夏王集别本》十五卷是别本;晋挚虞撰《文章流别集》四十一卷是正本,《文章流别别本》十二卷是别本。清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四十《文章流别本》十二卷按:“此或是《文章流别别本》,为

谢益寿(谢混,字益寿)所删存者,转写夺下别字欤!”(四)全本和钞本。抄撰是南北朝时盛行的一种著作方式。抄撰就是边抄边撰,抄撰一体,抄中有撰,撰在其中。通俗地说,抄撰就是节钞。南北朝时尚未发明雕版印刷,多卷著作的抄写颇费时日。为了节省抄写和阅读的时间,出现不少多卷著作的节钞本。《隋书经籍志》中著录了不少全本和节钞本,如晋王叔和撰《脉经》十卷和《脉经钞》两卷;南朝宋刘义庆撰《集林》一百八十一卷和《集林钞》十一卷;南朝宋谢灵运撰《诗集》五十卷和《诗集钞》十卷;谢灵运撰《赋集》九十二卷和《赋集钞》一卷;南朝宋殷琰撰《妇人集》三十卷和《妇人集钞》二卷;南朝孔道撰《文苑》一百卷和《文苑钞》三十卷;南朝齐陆澄撰《地理书》一百四十九卷和《地理书钞》二十卷。(五)丛书本和单行本。丛书是指汇集多种著作为一书而冠以总名的著作。南朝齐陆澄汇集 160 种著作为一书,题名《地理书》,共有 149 卷,它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丛书之一。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此书,称之为“澄本”。澄本之外,又著录了《山海经》二十三卷、《水经》三卷、《黄图》一卷、《洛阳记》四卷(无名氏)、《洛阳记》一卷(陆机)、《洛阳宫殿簿》一卷、《洛阳图》一卷、《述征记》二卷、《西征记》二卷、《娄地记》一卷、《风土记》三卷、《吴兴记》三卷、《吴郡记》一卷、《京口记》二卷、《南徐州记》二卷、《会稽土地记》一卷、《会稽记》一卷、《随王入沔记》六卷、《荆州记》三卷、《神壤记》一卷、《豫章记》一卷、《蜀王本记》一卷、《三巴记》一卷、《珠崖传》一卷、《陈留风俗传》三卷、《邺中记》二卷、《春秋土地名》三卷、《衡山记》一卷、《游名山志》一卷、《圣贤冢墓记》一卷、《佛国记》一卷、《游行外国传》一卷、《交州以南外国传》一卷、《十洲记》一卷、《神异经》一卷、《异物志》一卷、《南州异物志》一卷、《蜀志》一卷、《发蒙记》一卷等 39 种著作单行本。又如南朝梁任昉撰《地记》,在陆澄《地理书》的基础上,又增加了 84 种著作,共计二百五十二卷,《隋书经籍志》在著录任昉撰《地记》二百五十二卷的同时,又著录了《三辅故事》二卷、《湘洲记》二卷、《吴郡记》二卷、《日南传》一卷、《江记》五卷、《汉水记》五卷、《居名

山志》一卷、《西征记》一卷、《庐山南陵云精舍记》一卷、《永初山川古今记》二十卷、《元康三年地记》六卷、《并帖省置诸郡旧事》一卷等 12 种著作的单行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子部·杂家类·杂编》按语说:“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,惟《隋志》载《地理书》一百四十九卷,录一卷,注曰:‘陆澄合《山海经》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。澄本之外,其旧书并多零失,见存别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。’又载《地记》二百五十二卷,注曰:‘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。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。见存别部自行者惟十二家。’是为丛书之祖。”

4 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的撮本

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撮本 11 种:一字石经周易一卷、一字石经尚书六卷、一字石经鲁诗六卷、一字石经仪礼九卷、一字石经春秋一卷、一字石经公羊传一卷、一字石经论语一卷、一字石经典论一卷、三字石经尚书九卷、三字石经尚书五卷和三字石经春秋三卷。据《隋书经籍志》经部小学类序:对于汉魏石经,“贞观初,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,十不存一。其相承传拓之本,犹在秘府。”其中,“拓”字似为“撮”字之误。拓本和撮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拓本又叫墨本,是把金石器物上面的文字、图像拓下来的纸本。“拓”的具体方法是先将器物上蒙一层较薄的湿纸,拍打后使其凹凸分明,然后晾干、上墨,显出文字、图像来。因为拓本手续复杂、难度较大,南北朝时期,人们似没有掌握这项技术。如果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者确为拓本的话,当时的拓本当有很多,绝对不止 11 种。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著录碑刻 270 余块,这些碑刻文字模糊,不可识读,如《河水篇·龙门三碑》云:“文字素灭,不可复识。”《汾河篇·介子推祠碑》云:“文字剥落,无可寻也。”《洛水篇·晋潘岳父子墓碑》云:“碑石破裂,文字缺败。”《谷水篇·广野君庙碑》云:“文字剥落,不复可识。”《渭水篇·太公庙碑》云:“文字褫缺,今无可寻。”《颖水篇·汉蔡昭墓碑》云:“碑字沦碎,不可复识。”《渠水篇·汉陈相王君造四县邸碑》

云:“文字剥缺,不可悉识。”《沔水篇·华君铭》云:“文字磨灭,不可复识。”《湍水篇·汉左雄碑》云:“碑字紊灭,不可复识。”《湔水篇·三王城碑》云:“文字阙落,不可复识。”《湘水篇·舜庙二碑》云:“文字缺落,不可复识。”如果当时确有拓本,郾道元面对“文字磨灭”的碑刻,定然不肯罢休,一定会找拓本加以核对。像郾道元这样雅嗜碑刻者尚且不知拓本为何物,遑论其他。退一步说,即使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拓印的方法,拓印石经也不可能,因为从汉魏石经的流传情况看,历经磨难,“十不存一”。拓印离不开原石,是就经石而拓之。既然经石不在,何来拓印?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 搨本则是影写之本。影写常用的具体方法是将字画贴在窗户上,以白纸覆其上,借着窗户外来光线勾勒出字画轮廓,再以浓墨填实。这种方法通常又叫响搨。唐代文献中大量出现的“搨书”人,干的就是这种工作。据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:弘文馆有“搨书手三人”,集贤殿书院有“搨书六人”,崇文馆有“搨书手二人”。又据唐何延之《兰亭记》:“帝命供奉搨书人赵模、韩道政、冯承素、诸葛贞等四人,各搨数本,以赐皇太子、诸王、近臣。”^[3]“传搨”一词为唐人所习用。唐窦泉《述书赋》序云:“刊讹误于形声,定目存于指掌,其所不睹,空居名额,并世所传搨者,不敢凭推,一皆略焉。”这里“传搨”二字,就是影写之意。又如唐窦泉《述书赋》卷上窦蒙注:“杨肇,字季初,荥阳人,晋荆州刺史。今见草书一纸,共十行,有古署榜,无姓名,今共传搨之。”从引文可以看出,后人所传搨的不是金、石器物上的文字图像,而是晋代著名书法家杨肇写在纸上的十行草书,这里“传搨”也是影写的意思。可见《隋书经籍志》所谓“传拓”当为“传搨”之误,其著录的11种图书当为搨本。其实,不少学者早对《隋书经籍志》关于“相承传拓之本,犹在秘府”的记载表示怀疑。著名学者罗振玉说:“惟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一字、三字石经,其言曰:‘相承传拓之本,犹在秘府’,似梁隋所藏石经信为墨本者。然传拓(搨)之名,书画家皆用之,乃就本响拓(搨)摹放。《隋志》之言‘传拓’,果为就石施墨与否,亦尚未能断定。”^[4]他举出三条理由说明拓印始于

唐代。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则断言: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者均为“响搨”。他在《两晋南北朝史·晋南北朝学术史》中列举了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的11种图书和“相承传拓”一语后说:“然则,响搨之由来久矣。然刻板之术未行,经籍终恃手写。”接着又罗列了南北朝刘芳、蒋少游、沈崇僚、袁峻、庾震等抄书的例子。可见,吕思勉先生对《隋书经籍志》中“传拓”就是“响搨”的解释毫不怀疑。

5 《隋书经籍志》产生的历史背景

作为版本目录,《隋书经籍志》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,唐代古籍版本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大发展,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:(一)唐代出现了大量同书异本。除了善书、旧本、异本、古本、梵本、胡本、佳本、良书、正本、别本、副本等名称外,还出现了俗本、好本、净本等名称。例如《汉书·辛庆忌传》说:“光禄勋行义修正,柔敬敦厚,谋虑深远。”唐颜师古注云:“今流俗书本,‘柔’字作‘果’者,妄改之。”此之“流俗书本”即俗本,指广为流传的本子。又如唐张守节《史记正义·论事例》云:“《史》、《汉》文字相承已久,若‘悦’字作‘说’、‘閤’字作‘閤’……此之般流,缘古少字,通共用之。《史》、《汉》本有此古字者,乃为好本。”此之“好本”即善本。又如清俞樾《茶香室三钞·净本》云:“唐人以写定之本谓之净本,今人以真草对言矣。”可见唐人所谓“净本”即抄写之后的定本。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,佛经传本各异,一经多译的现象非常普遍,同书异本的数量更多。(二)唐人对同书异本的研究也很重视。可考唐代官方大规模校书至少有七次,其中第二次校书从唐太宗贞观二年(628年)直到唐高宗显庆中,历时30余年^[5]。著名学者陆德明、颜师古、陆淳、郭京、颜元孙、张参、唐玄度等都为校对同书异本作出了重要贡献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、颜师古《汉书注》、陆淳《春秋经传纂例》、郭京《周易举正》、颜元孙《干禄字书》、张参《五经文字》、唐玄度《九经字样》等都是研究同书异本的重要著作。(三)

唐代关于“善本”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,“上品”、“善书”、“良书”、“好本”等词语大行于世。如《旧唐书·蒋乂传》:“(蒋)乂料次逾年,各以部分,得善书二万卷。”《旧唐书·刘洎传》云:贞观七年(633年),为了教育皇太子,刘洎上书说:“臣愚以为授以良书,娱以佳宾,使耳所未闻,睹所未见,储德愈光,群生之福也。”以上所谓“善书”、“良书”,都是善本的意思。唐代僧人也很重视善本,西行取经者有玄奘、玄照、师鞭、道方、道生、明远、义朗、智岸、义玄、彼岸、昙闰、智弘、无行、大津、义净、贞固、道宏、不空等52人^[6]。为了寻求佛经善本,他们翻越万水千山,克服艰难险阻,甚至献出了生命,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(四)唐代也出现了道宣《大唐内典录》、智昇《开元释教录》、玄逸《释教广品历章》等版本目录。道宣,丹徒人,唐代名僧,中国佛教律宗的创立者。其《大唐内典录》中的《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》和《历代众经总撮入藏录》著录的单译和重译,实则同书异本;《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》实则善本目录,“于异译别行诸经,各择其最善一本,以为代表”^[7]。智昇,唐长安西崇福寺僧人,其《开元释教录》二十卷分为总录、别录、入藏录三大部分。《总录》十卷,著录唐代及唐代以前19朝译经事,以译人为经,以译经为纬,每经著录同书异名、译时、译地,也就是著录了同书异本的书名、出版时和出版地。《别录》八卷分为七录:“有译有本录”著录单译、重译的不同译本;“有译无本录”著录大量阙本;“删略繁重录”就同书异本“详校异同,甄别得失,具为条

目”;“疑惑再详录”著录疑本14部;“伪邪乱真录”著录伪本392部。还附录了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等节钞本54部。玄逸,河西人,玄宗外祖,长安华严寺僧人。其《释教广品历章》也是一个版本目录,该目录是玄逸网罗众本、精心校勘的结果。总而言之,《隋书经籍志》成为一部版本目录,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乔好勤. 中国目录学史[M]. 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1992:142.
- [2] 李延寿. 北史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3:3343.
- [3] 张彦远. 法书要录[M]. 台北: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86.
- [4] 罗振玉. 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[M]. 扬州: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98:49.
- [5] 曹之. 中国古籍版本学[M]. 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07:67.
- [6] 梁启超. 中国佛教研究史[M]. 上海:三联书店,1988:25.
- [7] 姚明达. 中国目录学史[M]. 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84:266.

曹之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通讯地址: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。邮编430072。

孙文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。通讯地址同上。

(收稿日期:2008-06-19)